新史學二十九卷二期
二〇一八年 六月

評 Rebecca Doran, *Transgressive Typologies: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arly Tang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7. 260 pp.

朱先敏*

作者 Rebecca Doran 是美國邁阿密大學(University of Miami)現代語言與文學系的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文學、性與性別、女性文學和史學史。本書改寫自作者於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東亞系的博士論文。[1]從已發表的專書論文與期刊論文可看出這位作者長期關注話語如何建構性別與權力、使其被認知的問題。例如她注意到北朝到隋代「貓鬼」相關的儀式和信仰其實和性別與階級密切相關。又如她撰文討論柳永詞和謝靈運(385-433)〈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展現了對於文學詮釋的掌握。Doran 指出柳永詞裡的情愛書寫其實是一種既有的書寫範式(typology)，而謝靈運的擬作也不該僅被視為對單一詩人的致敬，而應看作劉宋文學界對曹魏文學集團的迴響。Doran 的論題顯示出她關注文學材料並能提出創新的見解，此一研究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1 Rebecca Doran, “Insatiable Women and Transgressive Authority: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arly Tang China”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取徑和角度也反映在本書所選用的研究材料上。[2]從博士論文到專書出版，題目名稱的修改彰顯了 Doran 關注的問題不只是初唐時期(618-712)權力與性別的概念如何被建立，更重要的是，初唐以後的史家、小說家等書寫者怎麼認識此一時期的權力與性別。typologies 被提上了主標，更加強調敘事範式(narrative typology)如何構成、歷史事實如何被建構((re)construction)，這也是全書各章節共同指向的核心。

以武曌(690-705 在位)為代表的初唐女性政治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富，本書的突破在於並陳了正史、野史、小說，乃至於詩歌等各類材料。Doran 不受限於「紀實」與「虛構」的界線，將每一類文體都當作書寫範式的一環，試圖從不同書籍所選用的史事及其節選情節、個人傳記試圖彰顯的主題、用字遣詞及典故，鋪寫出一條歷時性的傳承、共時性的互文脈絡。初唐女性掌權者的形象、後人對於她們治下的政局與民情的認識，都一定程度地受到這樣的脈絡影響。此一研究進路讓文學作品成為史學研究上的重要材料，而不僅是正史、別史和出土文獻的佐證，也凸顯出各類型的史料皆具有文學意趣與書寫者匠心獨運的面向。

---

2 Rebacca Doran, "The Cat Demon, Gender, and Religious Practice: Towards Reconstructing a Medieval Chinese Cultural Patter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5:4 (2015): 689-707. Rebacca Doran, "Educ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in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unese Literature (1000 BCE-900 CE)*, edited by 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and Xiaofei Tian, 95-1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Rebacca Doran, "'Altogether Another Flavor of Emotion to Torment a Man': Typology and the Expression of Sentiment in Liu Yong's Ci," *T'oung Pao* 99:4-5 (2013): 1-28. Rebacca Doran, "Building Power: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Projection of Identity, and Female Power in the Late Seventh and Early Eighth Centuries,"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FLSC)* 6:4 (2012): 472-489. Rebacca Doran, "Perspective and Appreciation in Xie Lingyun's 'Imitations of the Crown Prince of Wei's Gatherings in Ye'," *Early Medieval China* 2011:17 (2011): 51-73.

本書以武周(690-705)到唐景龍年間(707-710)為斷限，以武曌、韋后(約 666-710)、太平公主(約 665-713)和安樂公主(685-710)幾位掌握政治權力的女性為中心，探討史家、小說家對於其事蹟、生平的書寫，如何通過既有書寫範式的影響而建構、甚至改造了她們作為女性政治人物的形象。全書分為六章，前言說明本書的研究對象包含上述四位女性政治人物及其男性同盟者，並試圖拆解讀者對「史實」的既有認知，指出史實是史家透過文字描寫逐漸建構而成。第一章〈女性統治及其再現——性別、典範與歷史敘事〉(Female Rul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Gender, Paradigm,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以唐前女主的傳記為例，說明從西漢呂后(241-180 B.C.)、東漢鄧后(81-121)，乃至北魏文明太后(442-490)、靈太后(?-528)，後代史家對她們的褒貶大多以是否能維護既有父權體制為標準。基於此，傳主的行為是孝、不妒、撫養非親生子，還是妒忌、淫亂就成為史書評價的重點。第二章〈(自我)表述與性別化的正當性——七世紀晚期景龍文學中的身份陳述〉((Self)Expression and Gendered Legitimacy: Projection of Identity in Literature of the Late Sev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Jinglong Era)以初唐公讌詩為主要材料，分析應制詩裡對女性政治人物的讚頌，其頌揚策略是將女性掌權者的美貌和才能比附自然美景，用意在於將該位女性的所擁有的政治權力視作宇宙循環的正道，因此能夠取得掌權的正當性。作者著力標舉這些寫於女主「生前」的文字，以此來對比著於「死後」的史書評價。第三章〈儀式、符號與女性權力的詮釋〉(Ritual, Sig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Female Power)進而從史書如何記載女性掌政時期的儀式、祥瑞為例，說明女主生前用以歌頌其掌權正當性的天道循環，在她們死後成為女性掌權違背萬物規則的實證。為了凸顯武曌對於祥瑞的重視正證明了其統治不具有正當性，史傳的敘事乃聚焦於忠臣如何駁斥藉祥瑞奉承的小人。第四章〈營造權力——象徵性建築、鋪張消費與女性統治〉(Buliding Power: Symbolic Architectur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Rule by Women)從女性掌權者

所享有的物質享受出發，探討居住的建築、擁有的產業、穿著、乃至於過於鋪張的婚儀，指出史家書寫的重點在於女性政治人物的過度消費如何耗損國力、違反社會規則。兩《唐書》的〈五行志〉特立「服妖」一節，使得女性的服飾成為國力盛衰的指標。第五章〈性別混亂與女性統治的修辭性顛覆〉(Gender Anarchy and the Rhetorical Overthrow of Female Rule)聚焦於女性掌權者的男性同盟，分析支持或反對女主的男性如何互動，以及男性如何以贈送與接受女性來建立關係、組成集團，甚至掌權女性也可以藉由引薦男性情人來作為討好女性上位者的手段。這些記錄顯示出史家對女性掌權者的書寫聚焦在性與性別，因此批判男性同盟的關鍵不在於傳主本身的作為，而是史家藉著傳主來揭示一個混亂動盪的社會氛圍，而一切亂源正肇因於女性逾越了應有的性別分際。最後一章是結論，以上官婉兒(664-710)墓的出土文獻再一次將掌權女性的生前與死後的評價對比，證明史傳書寫者的文字有其範式。作者進而將初唐女性政治人物的形象展演從八世紀到宋代，延伸到明清乃至近現代，說明後人對於這些女性的形塑，其實都和當下意圖處理的議題明確相關，看似客觀的史傳其實依然受到書寫者所建構的範式影響。

本書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作者試圖辨析初唐女性政治人物如何在史家書寫下被塑造成特定的形象；第二，更進一步對比唐前女性政治人物，說明史家描寫的形象未必出自作者的個人評價，反而受限於代代相承的書寫範式的規範；第三，分析歷史書寫的範式可以凸顯出從性別的角度重新檢閱歷史的價值。本書的章節安排根據上述三個層次環環相扣，第一章以唐前女主的傳記來說明史評的範式，第二章討論生前歌頌則與第三章的死後評價相互參照，顯現出史筆對「評價」的決定性作用。第四、五章則分析史書如何描寫女主所擁有的物質（以及在權力下等同於物質的男性同盟），試圖拆分出「史實」和「範式」的差異。作者在前言雖然花費相當的篇幅提出「歷史是後人建構的」的觀

點，但這其實並不算創見。因此這本書最令人期待之處，在於作者如何區分現代所能得見的「史實」與書寫者有意為之的「範式」。

Doran 靈活地運用各類史料，除了兩《唐書》、《資治通鑑》以外，筆記小說如《朝野僉載》、《大唐新語》也是論證的重要素材。本書跨越文體的取材方式之所以有效，原因在於 Doran 提出「謠言」(rumor)是史書述及女主時的重要消息來源。她認為，不論是北魏靈太后與得力助手鄭儼(?-528)究竟有無性關係、太平公主與朝中黨羽有沒有私通，史家皆以似乎不證自明的「時人未知之」或曖昧的「私謁」、「通」、「寵」帶過。這些史書上的留白，到了筆記小說中大放異采，不論是武曌公然與千金公主談論薛懷義(?-694)的性器官，或者張易之(?-705)、張昌宗(?-705)兄弟面對災異的放恣傲慢，都在小說中越發渲染、發酵。筆記小說在 Doran 的運用下，彷彿是歷史的顯微鏡，將正史對女主點到即止的懷疑揣度，放大成了一篇篇引人入勝的亂世「腥聞」。

除了史傳類的書籍，Doran 的另一大突破在於選用公讌詩分析時人對女性掌權者的評價。宴會上的酬唱向來被視為社交場合的應酬之作，在中國文學歷來以作者情志為主要分析進路的偏好下，[3]公讌詩成了相對冷門的素材。Doran 對於公讌詩的研究不僅是用作史實的補充，更提取出詩人所運用的意象以及比附景物與頌美對象的策略。她指出

3 中國文學史上的點評、詩話歷來講求「文如其人」、「知人論世」，主張從作者的生平際遇解讀詩文的創作背景及內涵。顏崑陽將此一現象定名為「情志批評」，並對此進行反思。參車行健對情志批評術語淵源及其影響的介紹，車行健，〈「情志批評與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導言〉，《思與言》，53：4(臺北，2015)，頁 1-8。中文學界也注意到中國文學作品與作者之間具有個人性的密切關聯，因而引發一系列關於「中國文學是不是具有抒情傳統」的思辨，參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一個現代學術思潮的論文選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陳國球，《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從太平公主、上官婉兒以及奉和文人的詩作，可以歸納出「大自然」(the nature)和自然「如何反映權力」(expression of power)是女性作為政治家的身份認同的關鍵性修辭。因此在野外跋涉或遊賞的敘述，不只是群臣出遊的現實地景，宮廷詩人同時也藉此架構出掌權女性天人合一、合乎天道的統治正當性。[4]

為了辨析史家描寫女性掌權人物的範式，Doran 以不同時期、不同人物的傳記為對照，凸顯出「範式」與「史實」之間的距離。比如以長寧公主(680-?)的傳記為例，指出史家在書寫以武曌、韋后、太平公主為主的群體時，往往使用同樣的譬喻，且敘事重點同樣聚焦在性與物質享受，因而抹除了不同女性之間性格、舉止和意圖的差異。導致每一篇女性傳記都只是女性掌權之惡的例證，看不見傳主的主體性。因此，長寧公主被用來證明當時宮廷中的女性過度消費對國力的耗損，即使長寧公主根本不屬於武周到景龍年間擁有政治權力的女性集團一員。而當史家記載安樂公主搜盡奇鳥而製成的千鳥裙時，其目的在於經由此一物種滅絕的證據，來凸顯女性掌權所違背的自然規律。不論是游離權力核心外的長寧公主，或者曾一度握有政治力量的安樂公主，在史書作

4 Doran 於書中引用了鄭雅如(2012)關於上官婉兒當代評價的研究。其實鄭雅如在另一篇文章(2014)中，進一步將上官婉兒置於一個更全面、結構性的女性官僚體系進行討論。上官婉兒的政治影響力固然有個人才能、親近皇室等特殊原因，但自武后始、至中宗大盛到睿宗猶有餘緒的女性參政之風，才是上官婉兒能發揮所長、位列人臣的基礎。Doran 或因全書以個別女性掌權者為論述主軸，故未從官僚化的面向進行討論。然而如果能呈現出這些掌權女性所以能獲得權力的原因與時代風氣和政治體制有關，便能與第一章所述及的唐前女主做出更明顯的時代區隔，同時，也能夠更加凸顯出史家書寫只重視「個人」其實反映了將女性政治人物傳記限縮在私情、私怨的書寫角度。參考鄭雅如，〈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平反與當代評價〉，《早期中國史研究》，4：1(臺北，2012)，頁 111-145；鄭雅如，〈唐代前期預政女性身分的官僚化——從上官婉兒墓誌談起〉，《中國史學》，24(東京，2014)，頁 87-102。

者筆下都僅是用以彰顯女性掌權亂國、違背天道、致使民不聊生的例證。

本書的另一處精采示範則在於兩代駙馬爺的命運對比。唐代前期如太平公主與安樂公主自擇駙馬、駙馬藉由私幸公主以求晉身的行為，在史書和小說作者筆下成為初唐女主執政所導致的混亂局面。而書寫者處理唐代後期與公主相關的亂事上卻有不同的裁度。唐宣宗(846-859 在位)為萬壽公主擇婿，宰相白敏中(792-861)舉薦狀元鄭顥(?-860)為駙馬，導致他不得不放棄已經訂親的世家女。因此在獲得駙馬高位之後，鄭顥不斷藉著與宣宗的親近關係報復白敏中。在這則故事中，史家聚焦於鄭顥不理性的復仇，藉此烘托宣宗是一個教誨女兒為妻之道、明察秋毫、不受駙馬蠱惑的明君。在此敘事結構下，萬壽公主不過是皇帝、宰相、狀元／駙馬彼此角力、運作，被史家用以呈現帝王賢明、宰相逢迎、駙馬弄權時的道具。Doran 強調，武曌掌權的盛世和宣宗執政的末世在書寫者筆下，反而形成女主治下政局混亂和男主統治的局勢清明。書寫範式的作用居然足以顛倒史實，顯示出範式和史實的距離，並凸顯史家對女性掌權者的偏見。

本書藉著女性傳記千人一面的現象，以及史家對男女執政者的褒貶差異，呈現出範式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有效性。然而這樣的嘗試並非每一次都能成功。Doran 以公讌詩作為女性掌權者生前的評價，而將史書的敘述一律視為死後評價，不論其內容是再現武周君臣的朝堂對立，或者撰寫者的史贊和對史料的選材，由此推衍出女主生前所獲的評價大抵正面、死後則轉為負面評價居多的結論。然而這樣的分類與歸納，其實忽略了文本性質的影響。比如：公讌詩乃宴飲酬唱、應制之作，受限體裁而很難摻入對女主的批判諷諫。基於文體上的區別，致使「當代」幾乎不可能出現批判、「後代」也不太容易出現褒揚，Doran 以此來說明女主在生前與死後評價的兩極，是否可謂周全呢？

生前和死後評價的差異之所以重要，除了用以說明現代人所認知

的女性掌權者形象已經受到史書範式的影響外，更重要的是，Doran 試圖用評價的差異證明，同一套「天道運行」的規律在不同時期有不同作用，這顯示出文人的書寫所依循的並非史實而是範式—自然規律在公讌詩裡是女主執政擁有正當性的證據，在史傳裡卻是用以駁斥女主合法執政權力的工具。然而這一點只能證明天道運行規律從武曌掌權的八世紀到司馬光(1019-1086)寫《資治通鑑》時的十一世紀一樣具有說服力，時人習以此說明自己支持或反對女主。就 Doran 所引述的證據來看，對天道運行的強調體現了時人的價值觀，以此得以成就史書作者對女主批評的有效性，而不僅僅是書寫公讌詩或史書、小說的範式，Doran 試圖藉此指出史實和範式之間的距離，反而讓讀者開始質疑究竟何為史實、何為範式。

隨著婦女研究的興起，歷史上的婦女—無論是有名的個體或無名的群體—逐漸獲得研究者的青睞。作為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曌毋寧是最早、也獲得最多關注的女性歷史人物。在前人豐厚的研究基礎上，2017 年出版的本書該如何寫出新意？Doran 將武曌、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婉兒和太平公主視為景龍朝前後掌權的女性群體，並以當代與後世詩人、史家、小說家對她們的刻畫作為研究的核心。在浩瀚又渺遠的歷史長河裡，不論女皇帝或掌政女官都漸次成為模糊曖昧的符號，史家描述的真實或虛構已不能截然二分，預政女性的書寫範式中所凸顯的性別意識，或許才是當代人最能掌握、也最應辨析的關鍵。

(本文於 2018 年 3 月 7 日收稿，2018 年 5 月 8 日通過刊登。

本期原訂 2018 年 6 月出刊，因故延至 2018 年 9 月出刊。)

*本文初稿承蒙中研院史語所李貞德老師細心指點，又獲得匿名審查人與編輯的建議，在此謹申謝忱。